

杨东平
著

教育需要一场革命

杨东平教育随笔

上海人民出版社



杨东平 著

杨东平教育随笔

上海人民出版社



教育需要一场革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东平教育随笔:教育需要一场革命/杨东平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ISBN 978-7-208-06966-4

I. 杨... II. 杨... III. 教育-随笔-中国-文集
IV. G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46010号

责任编辑 罗 湘

封面装帧 王小阳

杨东平教育随笔

——教育需要一场革命

杨东平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6.25 插页 4 字数 196,000

2007年5月第1版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250

ISBN 978-7-208-06966-4/G·1134

定价 28.00元

目 录



一、教育时空

- 倾斜的金字塔·····3
- 小草和大树:另一种生态平衡·····6
- 语文课:我们失去了什么·····9
- 天才的诞生·····18
- 千年教育:文明之火的照耀·····20
- 教育需要一场革命·····25
- 我看“教师暴力”现象·····31
- 透视“韩寒现象”·····33
- 广东教育故事·····36
- 网上硝烟·····39
- 中学生的内心世界·····42
- 以陶为师话行知·····45
- “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49
- 解读前元庄·····52
- 改革呼唤教育家·····56
- 读经之辩:回到常识和现实·····59
- 儒教与儒学·····62
- 对教育的根本态度·····65



	“南京沦陷”·····	67
	“大龄”流动儿童教育需要新的关注·····	70
2	改善教育公平状况正当其时·····	73
	政府的教育职责究竟是什么·····	76
	取消重点学校制度具有可行性吗?·····	78
	科举制度的教育文化遗留·····	81
	超女、王垠和祭孔·····	84
	没有择校的城市·····	87
	百年职校的五重价值·····	89
	北京小学生的新战场·····	92
	重温“平民教育”的精神·····	95
	“小升初”改革何去何从·····	98
	反思红卫兵产生的教育原因·····	101
	孩子会输在起跑线上吗?·····	105
	教育“乱收费”乱在何处·····	108
	解析“上学难、上学贵”·····	112
	改革是一种境界·····	117
	孟母堂事件和“在家上学”的合法性·····	120
	我国有几个教改方案?·····	123
	制度创新是可能的吗?·····	126
	“择校费”的破解之路·····	129
	流动儿童教育呼唤制度创新·····	132

二、 大学之道

	大楼与大师·····	137
	大学:多大算大?·····	140

北大找北·····	143
“高考分数线”的倾斜和矫正·····	146
大学生的“背叛”和挑战·····	149
“跑部前进”面面观·····	153
“部级大学”何时休·····	155
大学校长：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	158
博士生教育：最后的防线·····	163
大学之痛：关于贫困生欠交学费·····	165
解读一个新大学的传奇·····	168
丹青之思·····	172
香港中文大学的“国际化”之争·····	175
如何评价中国的大学教育·····	177
重视高考“性别歧视”之外的问题·····	180
适时调整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	183
从周长城案看高校的学术民主·····	185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与教育公平·····	188
香港高校内地招生的“鲑鱼效应”·····	192
道德沦落还是“反制度”抗争·····	194
从制度上矫治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虚假·····	197

三、感悟与随想

女人和钢琴·····	203
自己疼自己·····	206
四种人·····	208
为谁辛苦为谁忙·····	211
还有爱情吗？·····	214



	中国人的年龄·····	217
	我所认识的金凯·····	219
4	双星陨落:何日君再来·····	222
	幸福的感觉·····	225
	华山一夜·····	227
	重返黑土地·····	230
	山野庶民的交响·····	237
	重游黄山记·····	240
	包容之难·····	244
	富贵与高贵·····	246
	阳光下的感动和希望·····	251

教育时空



倾斜的金字塔

看了花季少年这些充满辛酸的无忌之言，心中的感觉已不止是沉重二字。这些年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同类报道，关于“黑色的七月”，关于“考试地狱”。连本文的标题也是1988年《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教育报道所用过的。我也曾目睹过楼下一个六年级的女孩，深夜洗脚时，脚浸在水里就坐着睡着了。而且，我们还知道许多更为惨烈的花朵凋落、青春陨灭的悲剧。

因而，我不禁感到了庆幸。庆幸自己总算还有个相对快乐的童年和青少年——许多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这种庆幸；庆幸自己没有孩子，可以免受此难——许多年轻夫妇一想到孩子的教育都不寒而栗。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当然更感到惭愧。

从1901年废除八股文章、1904年建立第一个现代学制、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算起，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已将近一个世纪。我们取得了众所周知的巨大进步。但是，上述事实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有1300余年科举教育传统的国家，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何其艰难；我国当前的教育就其精神实质而言，离现代教育还何其遥远！

80年代以来，智育至上、考试至上、片面追求升学率之风屡禁不



止、愈演愈烈,其原因发人深省。很多人认为这是由日益尖锐的供需矛盾决定的;但这种看法是似是而非的。统计表明,50年代初,大学招生和高中毕业生的比例是1:1.1左右;1962年为1:4.2;1979年,这一比例曾高达1:27.5;此后,由于中等教育结构的调整,这一比例开始下降,1984年为1:4.0;1990年为1:3.8。事实上,近几年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这一比例已降低到约1:1.2左右,和50年代差不多。然而,升学竞争却恶性发展,达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程度。中国中小学教育的难度之高、负担之重、学习时间之长,已成为世界之最。

我认为,造成这一病态,陈旧落后的传统教育观念可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具有深厚的教育传统,全民族具有重教兴教的巨大热情,这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资源。然而,没有经过更新转换的传统文化并不能自动地成为社会现代化的动力;变革传统教育、实现教育现代化始终是20世纪中国教育紧迫的主题。

现代教育有别于传统教育,简而言之,前者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教育,按照青少年生长的实际需要组织教学,从而取代了19世纪形成的“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的金科玉律。1918年,美国改革中等教育,明确中学不应成为大学预科,而是提供一种适合大多数人学习、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为生活作准备的教育”。为中学制定了著名的“七项基本原则”(培养目标):健康、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价值地利用闲暇时间、有效的家庭成员、基本学习过程的掌握、合乎道德的品质、职业训练。本世纪初,这场全球性的教育变革不仅对美国 and 西方,而且对我国二三十年代的中小学教育产生过重要影响;陶行知、陈鹤琴等作出过重要贡献。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一过程并没有继续下去而告中断。

五六十年代,传统教育最激烈的批判者是毛泽东。在1964年的春节座谈会上,他尖锐指出“现在的考试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摧残青年、摧残人才,我很不赞

成,要完全改变”。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教育革命,有许多左的错误和有违教育规律的简单粗暴做法;令人遗憾的是,“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正在否定其左的错误的同时,对毛泽东教育遗产中这一最重要的革命性精髓似乎并没有相应的梳理和继承。

80年代以来,教育外部环境的恶化,教育经费、教师待遇等严重问题成为社会焦点和“教育危机”的主要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教育内在的问题;摆脱经济困境的努力压倒了改善教育品质、更新教育“软件”的需要。而创收、经营之道则正在助长着学校教育行为的变异。教育观念的变革、教育思想的更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造等等,从未真正成为学校和教育界的热点。中国教育所缺失的这一课,始终没有真正补上。

1985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当时主管教育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讲话中曾指出,如果不改变陈腐刻板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即使国家增加很多经费仍然培养不出大量的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型人才,特别是第一流人才”。的确,教育的现代性主要不是体现在“硬件”上,而是由“软件”制约和说明的。在教育现代化的坐标上,60年前陶行知实行“儿童中心”、“小先生制”、“教学做合一”的条件简陋的学校,显然比今天许多装备电脑、实行考试至上、题海战术的重点学校具有更多的现代性。

21世纪已经近在眼前,我们仍然在喊“救救孩子”,仍然需要重温70年前鲁迅的教导:对儿童的教育,主要是“理解”、“指导”和“解放”;要培养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

学海并非苦海,学校并非地狱。全世界儿童都在快乐地学习。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必须经过一场全民性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但愿新世纪的日历,也能满足中国孩子的愿望——每天都是星期天!

1995. 4. 2



小草和大树：另一种生态平衡

在某次关于青春问题的座谈中，一个名叫毛毛的 18 岁男孩引起大家的兴趣。他是一个 disc 舞厅的领舞。他自认不是个能读书的人，初三时辍学谋事，做过许多工作，最后当上了又玩乐又挣钱的领舞。他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无独有偶，不久前遇到另一个朋友，在琉璃厂开了个古玩店。聊起来才知道，他原是北大的学生，大二时与一韩国姑娘相爱结婚，退学行商。虽然，他们并没有违法或有害于社会，自己生活得也很快乐，也有人羡慕他们；但在传统的价值评价中，他们仍不过是脱离正轨的“不良少年”、“不良青年”。

80 年代以来，在经过一段漫长的否定知识、打击知识分子的时期之后，全社会重新崇尚知识、崇尚学习，新星辈出，名人闪光，追求成功、建功立业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这无疑是必要的和健康的。然而，物极必反，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当我们的社会生活已经相当多样化，青年有各种机会和途径去生存发展、自我实现，并越来越能够按自己的愿望去生活时，成人社会单一的价值评判并没有相应的分化。“唯有读书高”、“望子成龙”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思潮，社会舆论和长辈过高的期望、强行替子女作出的安排和选择、名人和明星的炫目光环，造成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过度压力，使很多人蒙上自卑的心理阴

影,不堪重负,或者无所适从。

应该看到,多年来我们所宣传的价值观,例如关于青年成才的宣传,对所谓“成功”的宣传和追求等等,功利主义的色彩过于强烈,往往以社会贡献的大小衡量价值、以世俗的功名成败评论英雄。然而,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没有惊天动地的伟绩、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勤劳、善良、敬业尽职的普通人总是占绝大多数,在这套评价体系中,不仅平凡的普通人和失败的英雄找不到自己价值的支点;在实际生活中那些具有崇高人格、独特个性和精彩而充盈的人生,那种极富情趣和个人魅力的人,也失去了生存的意义。

事实上,单纯追求功名的主流价值,并非无可评议。这个“正轨”,古以有之,就是世代相传的读书做官、科举取士、谋取功名,也就是《红楼梦》中贾政、宝钗经常教诲宝玉,并为宝玉、黛玉所鄙视、斥之为“禄蠹”的那种哲学。的确,人生一世,并非只有一个使命、只有一种活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多人虽生活在现代,却并不如宝玉、黛玉潇洒,甚至追名逐利,为名所累、为利、为舆论、为他人的期望和抱负所累。一位从西班牙回来的朋友说,在那里,很多人认为中国人



不可思议,认为他们“有病”:他们都很勤奋,分分钟都在挣钱,甚至比许多当地人更有钱,但他们却从不享受生活,决不会星期天去度假,或坐在海边喝啤酒,认为那是浪费时间。同样,世世代代,那些孜孜求学、终身苦读的学子是令人钦佩的,但他们中缺乏情趣、不懂生活、不明事理的人也似乎多了些。

其实,在谋取功名、成“才”成“名”之外,还有十分广阔的道路和多种选择。那就是首先追求成“人”,做一个身体和心理健康、富于情趣、热爱生活、有个性因而有魅力的人;同时追求过一种符合自己个性、因而也是更符合人性的生活。因为人是各不相同的,生活本来丰富多彩、千姿百态,正如自然界万物竞生、百花齐放,生物的多样性构成了大自然平衡的生态。小草和大树没有优劣之分,不应期望每一棵小草都长成大树,但小草同样无愧于大地和春天。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欣赏梅兰竹菊、闲花野草的机会和快乐,往往比仰望高山长河、参天巨树更多。古人云:“驼负百钧,蚁负一粒,各尽其力也;象饮数石,驷饮一勺,各充其量也。”在社会生活领域和伦理建设上,我们难道不应更中庸与平和,遵循和维系这种平衡吗?

1996.6

语文课：我们失去了什么

和很多人一样，当我看到《北京文学》关于语文课的讨论时，痛快淋漓之感和兴奋的心情难以言喻。几乎所有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对语文课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感受。记得“文革”前我上中学时，面对老师硬性划定的课文段落，心中总是纳闷，作家写作时是这样想的吗？在去年《实话实说》举行的“20年后话高考”的讨论中，有一位高三语文老师兴奋地发言，说现在的语文高考试卷，“鲁迅、巴金、郭沫若肯定答不上来！”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没有经过高三突击训练的大学的中文老师、中学的语文老师照样考不及格——这令我们想起“文革”中考教授关于“马尾巴的功能”的黑色幽默。我们的中学教学显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到这种有悖教育初衷、有违常理的荒谬之中。这是以考试为目的、以考试中心的教育，所谓应试教育必然蹈入的末路。在日本和台湾，这种考试主义、升学主义导致的教育病态和异化通常被称之为中小学教育的“畸形化”。

令人感到振奋的，不仅是积弊极深的语文课的问题终于被正式提出，而且在于这一声呐喊是由教育界之外文学界的志士发出的。《北京文学》敏感地意识到文学式微的教育根源，自觉地担当起文化改造的社会责任，实属难能可贵，令人钦佩。而且，由于它呼应了一



种失落已久的传统，因而特别发人省思。

现代语文课的雏形，大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在本世纪初我国新教育创建之始，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等无不身体力行，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教育改革。不必说鲁迅、李大钊、陈独秀等，胡适、蔡元培等不仅亲自办学，而且主持、参与了教材编写，进行了开拓性的尝试。如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合编《最新修身教科书》，顾颉刚著《现代初中历史教科书》。当时以推行白话文、改革封建教育为主旨的教科书改革，具有十分鲜明的人文立场、民主精神和现代性。1919年提出的新的“教育本义”，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宗旨。1922年制定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认为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并涵养感情德性；启发想象思想；引起读书兴趣；建立进修国文的良好基础；培养能达己意的表达能力”。编写语文教材的原则是“从儿童生活上着想，根据儿童之生活需要编订教材，形式注意儿童化，内容则适合儿童经验”。

在那个时代，新文化运动与新教育的重建浑然一体，知识分子与教育改革、文学革命与语文教学具有天然、有机的紧密联系。当时的许多文学大家，如叶圣陶、冰心、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等等，都有在中学从教的经历。作为现代化动力集团的知识分子参与了所有重要的教育决策，成为教育改革的中坚。事实上，当时的教育改革，所有重要的教育议案，有关的教育制度、政策、法规几乎都出自于这些教育家团体和组织。1922年颁行的“新学制”即“壬戌学制”，也是由全国教育联合会发起、酝酿和讨论修定，最后以大总统令公布的。

长期以来，作家、诗人、艺术家等人文知识分子精英与文科教育的天然联系，以及他们对文科教育的决策权和影响力早已失去。我们已经很少再听到文学家对教育的发言，更不用说参与语文教材的编审了——它已经成为一些行政干部和考试专家的专业。